

書叢小科百國中

陶行知

著青麥



知新·書·詩·活生

行發所行發洽聯海上

政治部宣傳

924

K82

新中國百科小叢書

陶 行 知

麥 青 著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上 海 聯 合 發 行 所 發 行

新中國百科叢書

陶 行 知

著 者 麥 青

發 行 者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上 海 聯 合 發 行 所

基 本 定 價 二 元 六 角
外 埠 酌 加 郵 運 費

出 版 期 卅 八 年 六 月 纔 初 版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陶 行 知

目次

- 一 求學時代……………(一)
- 二 平民教授……………(二三)
- 三 『野人生活』……………(二五)
- 四 『通緝令下』……………(三六)
- 五 抗戰年代……………(五二)
- 六 民主戰士……………(六五)

一 求學時代

中國安徽省南部，青蔥的黃山山脈綿延，清明的新安江靜靜地流淌。
新安江上流有一座著名的古城——歙縣，舊時喚作徽州。山脈圍繞着它，風景很美麗。

陶行知於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生在歙縣城西王墩源村。家境清貧。他原來的學名叫陶文瀾，後來改名行知。

他的父親任潮公，是一位謹嚴的家長。他接管了祖上遺留的一片醬園，勤苦經營。但終因大家庭兄弟不和，把醬園停閉，分了家。他在王墩

源村組織了小家庭，靠自己的勞力過活。

他的母親是一個慈祥勤儉的農村婦女。家境艱難，種田、挑水、燒飯、洗衣，樣樣都要操作；甚至丈夫兒子剃頭，都是她親自動手，省些錢來打油買菜。她生了二男二女，長子長女都沒成人，她的心血全部放在文瀾和女兒文漢身上了。

父母的勤苦勞作，在陶行知的生活上留有深刻的影響，使他的一生走向人民的道路。

六歲時，父親教他識字；後來進入私塾經館，習讀封建社會的一些「聖賢」詩書。他在學習上顯露着驚人的聰明。在三刻鐘的時間內能熟讀背誦四十三行左傳。父母對他懷着很大的希望。

自從帝國主義撞進了封建中國的大門，深山僻野都有外國傳教士建起的教堂和學校；高山峻嶺也堵擋不住這洶湧的潮流。歙縣城內有內地會教堂辦的崇一中學，陶行知十五歲時從經館跳進這個「洋學堂」；開始接受資本主義的教育，習讀英文數學。由於他的聰敏勤奮，三年課程，提前一年結業。

師友們都鼓勵他出外升學，年青的陶文濬也很嚮往外面的天地。他向父母說明自己的心願，請求到杭州學醫。

一個沒有成年的孩子，竟要單騎匹馬出外讀書，在那時真是駭人的事情；遠親近隣議論紛紛，都勸他的父母不要讓他遠離。

慈愛的父母也深深苦惱了：讓他去吧，小小年紀遠離家鄉，萬一有什

麼三長兩短，實在放心不下；不讓他去吧，埋沒了他的志向，誤了他的前程！堅強的意念終於克服了內心的矛盾，把深厚的同情給予了兒子。

病弱的父親並且發誓戒斷嗜好，用盡所有的心血，也要供給她讀書的費用。

一九一六年春天的一個早上，父親親自送他搭上開往杭州的帆船。第一次的遠別呵！三十年後，他回憶這初別的情景，淚落如雨地寫下動人的

詩句——

古城岩下，

水壘橋邊，

三學白日，

一個懷了無窮希冀的傷心人，

眼裏放出滄壯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兒子的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張大嘴，

隱隱約約的把帆影兒都吞沒了。

才慢慢的轉回家去。

我要問芳草上的露水，

何處能尋得當年的淚珠？

到了杭州，他很容易考進了廣濟醫學堂。如果他在這裏讀完醫學課程，也許他後來就成功一位名醫，但是人生的路途，好像萬山中間的溪

流，經過許多曲折，纔流到寬闊的河道。他進入學堂就碰到阻折了。

醫學堂是教會開辦的，規定是信教的學生才可以享受免費實習二年的待遇。於是問題擺在陶文濟的眼前了：他或者垂下頭讓那紅衣牧師在額上劃個十字，接受洗禮，就可得到特別待遇；不然，他就得另找出路。

他深深憤慨了：『學校怎能因為學生的信仰不同，就不同待遇！』他不肯低頭，毅然離開了杭州。

他跑到蘇州找到了他的表兄。貧困的生活開始考驗這個青年。他們時常要把衣物送上當典的高櫃，才能應付兩餐飯。饑餓給人的感覺，不能不發生人生影響！

這樣的生活撐持半年之久，他得到崇一學堂校長唐俊賢的幫助，考進

了南京著名的金陵大學文學系。他開始追求人生的許多問題。宋代理學家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深深打進他的思想。王陽明的傳習錄，反對正統學派的束縛身心的教育理論，主張「教育童子，應該讓他自由發展個性，教師止是誘導他向好方向就成。如果一味拘束督促，學生看學校如牢獄，看師長如寇仇，勉強裝出規矩，養成詭詐頹鄙的習氣，教他爲善，實際迫他爲惡。」這成爲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胚胎。

後來他曾把名字改叫陶知行，就是表示他對這位理學大師的景仰。

大學中的陶文濬是一個活躍分子，辛亥革命時期的民族革命思想感染着那一代的青年人。他在課外編寫着金陵光學報，組織愛國演講。雖然他攻讀的是文科，但由於英算的良好基礎，他常常幫助別科的同学解決數學

上的難題！

因為成績特別優良，他又趕早一年修完了大學課程，並且以第一名畢業！

這時，他的全家移居南京，他和他的前妻純宜結了婚。她是一個樸厚的女子，和他的妹妹文漢同學。後來陶行知獻身教育，她們給他分擔了少辛勞。

辛亥革命給古老中國一個新生的希望，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風行，「乘長風破萬里浪」到歐美留學，是青年們最感光榮的期望，他也多麼為這個期望所激勵啊！

但是，錢呢？沒有錢能夠到外國留學嗎？他不得不向親友求助，用了

不知多少懇切的言語和信件，持着「十扣柴門一扇開」的希望，終算借到了一筆赴美的旅費。

一九一四年秋天，他搭上開往美國的外國輪船，從一個封建落後的國度，向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度航行！

希望和依戀的情感，交織在他的心中；藍色的海洋沒有邊際地展在眼前；狂放的海風掀起波浪，掀起他的澎湃的思潮。他所去的國度的一切，曾在書本上或別人的口中，給描畫出一個朦朧的輪廓；轟天的樓廈，龐大的機械，都模糊地顯現了。在興奮的激情下，他寫下了最初的詩篇海風歌，可惜它被遺失，像海風吹過，沒留踪跡。

船在大海愈行愈快，他自言自語地說：

「好極了！」他想着教科書上說，這是蒸氣機關推動的，於是便走到機器間去參觀那複雜的機器，又一路走到火輪門口，只見幾個赤膊活人，像天津鴨子在那裏烤着，烤出一身的黑油，身上、臉上、手上黑得如同他們所燒的煤球一樣黑！這印象，照他自己的話說，「簡直像硝鎘水刻到心窩裏」。但，這時，他內心所激起的，還不過是一種泛愛思想的同情，只在十幾年後，中國勞工的力量成長膨大，他的思想向現實更深突進的時候，他才更明確地認識到工人主人翁的地位！

到了美國，他最初進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半年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他成爲美國實驗主義教育家杜威博士所賞識的學生，在這時奠定了獻身教育事業的志願。

杜威的實驗主義注重生活的實踐，人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支配生活環境；遇到困難，要假設問題試驗着去解決；不能解決時，再用別的方法試驗。他的教育思想口號是：『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這種學說是適合美國資本主義要求的，實際是一種唯心的理論；但所主張實踐精神有積極性的一面。陶行知接受這積極的精神，爲他以後教育工作的思想基礎！

在留學生中，顯明分出界線；有的經濟豐裕，縱情享樂，求學不過是『鍍金』罷了；但也有少數貧寒青年，不能不過着艱困的生活：課外時間向菜館，工場尋找工作，換取一段時間的生活費用。他也是其中的一個，有時以勞役取得報酬，更多的是賣稿，或者舉辦演講，這樣來維持學業！他潛心在研讀之中，勤苦奮鬥，按時地把生活情形報告家中。遙遠的

祖國的書信，也是他最親切的安慰。但不幸第二年他的父親去世了，這真是突然而來的打擊，他熱淚湧流，伏在床上痛哭！

他悲痛十分，妄想飛回國內，望慈父最後一眼，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明澈的理智使他不被哀痛的情感淹沒。他感到責任的加重，抹去淚水，仍然按時聽課，課外的時間就埋頭在圖書館中。常常到深夜，敲了閉門的鐘聲，他才獨自一人踱回宿舍。過度的疲勞使他沉入睡眠，但又常從夢中痛哭醒來。後來不久，接到家信，他的妻子生了第一個兒子，全家欣喜，他也得到一點安慰。但對於親人的情思，直到他的晚年，還不時的流露在詩文中間。誠摯的至情，隨着他思想的進步，擴大為對人民的熱愛，對事業不屈不撓的精神！

二 平民教授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他從美洲回國，踏上祖國的海岸，他的口袋中帶回了出國時所帶的錢。他完全靠自己的勞動維持三年學業。

三年離別，見了母親、妻子、妹妹，真是悲歡交集；他雙手舉起幼小的兒子桃紅，頻頻親吻他的臉頰。時光是多麼快的飛過，真像一個夢境，彷彿記得自己還是父親的愛子，醒來卻是孩子的父親了。

人生事業也從此標出一個起點！

他接受了南京高等師範學堂的聘書，開始了教授生活。他抱着一個改

造中國教育的願望，細心考察當時各級學校的教育實施情況。

他看到所有的學校，都還用着陳腐不合理的教育方法，「教師只會教書，只會拿一本書要兒童來讀它，記它，把那活潑的小孩子做個書架子，字紙簍；先生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家；學校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廠！」

「有些學校的教師，教學方法比較進步了，把注意的中心點，從書本上移到學生身上來了，凡是學生需要的，教師都拿來給他們，然而學生還是處在被動的地位，因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熱心的先生，固想將他所有的傳給學生，然而世界上新理無窮，先生安能盡把天地間的奧妙為學生一齊發明？」

對於教育上這種種的毛病，他認定有改革的必要。於是他在校務會議席上，提出用「教學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張。他說：

「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就是把教和學聯絡起來。對於一個問題，不是要先生拿現成的解決方法來傳授學生，乃是要把這個解決的方法，如何找來的手續程序，安排停當，指導他，使他以最短的時間，經過相類的經驗，發生相類的理想，自己將這個方法找出來，並且能夠利用這種經驗理想來找別的方法，解決別的問題。……」

這一個破壞傳統教育方法的提案，彷彿立刻刺痛了在座的教授們，使他們的自尊心受到了損傷。他們對他，這一個初回國的青年教授，都投來的眼光，聯合反對他的「標新」主張。

爲着理想的實現，他也不肯示弱，舉出了許多實例，引出了許多理論，來辯論解釋。結果，兩小時過去了，大家爭得面紅耳赤，他的提案仍然不被通過。因此他也拒絕擔任教育專修科主任的名義。

初步的教育改良的理想，頑固的社會都伸出鐵掌拒絕容納，他不免感到一些失望。但他絕不退卻，仍然把自己的主張寫成了一篇「教學合一」的論文，在時報的教育新思潮上發表。不久「五·四」運動發生，學校中同事無暇堅持反對意見，他就把全校的「教授法」改爲「教學法」。後來這「教學合一」更進一步發展爲「教學做合一」的理論系統，成爲他的教育理論的一個重要部份。

「五·四」運動開闢了中國新文化的道路，「平民思想」滲進文化的各

部門，陶行知和一些朋友，積極提倡平民教育。

一九二〇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舉辦了第一次暑期學校，發動留校同學，每晚進行教鄰近的一些『平民』識字。他在晚飯之後，總要按時跑到學校去查看。他和那些車夫，小販親切地談話，問長問短；絕沒有大學教授的架子。

有一個晚上，月亮那樣好，他和幾個朋友圍坐在園中草地上，互相談說各人的志願。有人問他：

「知行，談談你的抱負？」

「我嗎？」他沉着地回答着，「我的志願就是要用四通八達的教育，來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

他解釋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叫種種人受平民化：「一方面我們要打通層層疊疊的橫階級，如貧賤、富貴；老爺、小的；太太、丫頭等等。素來是不通聲氣的，我們要把他們溝通。又一方面我們要把深溝堅壘的縱階級打通，縱階級最昭著的是三教九流七十行，江南江北，浙東浙西，男男女女等都有惡魔把他們分得太嚴，這種此疆彼界也非打通不可。」

這種想法後來是被現實粉碎了。可是當時他是精神十倍的來推行這個理想。

他從和民衆的接觸中，首先發覺服裝的不同，使他和廣大的民衆，不能像一家人樣親近。於是，他毅然把知識分子的衣服脫掉，丟開了。他買了一件棉襖，一雙布棉套褲，一頂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頭頂。這種行

動引起了人們的議論，認為是他的矯情。可是，他自己非常得意，覺得完全是一個中國人了，並且與一般人民相近很多了。

他高興地寫信給他的妹妹說：「我本來是一個中國平民，無奈十幾年的學校生活漸漸地把我向外國的貴族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我的修養固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貴族的風尚卻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性，平民性是很豐富的；我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最中國的」留學生，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中國的平民化的路上奔流回來了。」

——他像一個行腳僧各處奔跑，親自把「平民教育」給人家送到大門上。他跑遍了南京的旅館、菜館；「大方棧」、「小樂意」、「萬全樓」，都有他的影子。

南京棲霞寺很有名勝，一九二三年的雙十節他跑到寺中去玩，知道寺中有四五個和尚不識字，可是他看見有個慧空和尚在看封神榜，他就和慧空招呼，問他說：

「和尚要修行成佛，不會唸經可以嗎？」

慧空回說：「不可以！」

他說：「要念經念得好，不會讀書可以嗎？」

慧空回說：「不可以！」

於是他就很懇切地說：「你們廟裏還有四五位和尚不識字，就不會唸經；不會唸經就不會成佛；大和尚何不去超度超度他們呢？」

然後，他又把自己編的平民千字課的效驗告訴慧空，勸他把全廟的和

尙，俗工教得個個識字讀書，考過及格，就給他一張平民教師的證書。慧空明白了道理，很情願地擔任了。

就用這類似的方法，他又到附近鄉村私塾裏，勸他們把平民千字課拿去代替三字經、千家文、百家姓；勸他們教過了平民千字課再教論語孟子。

一九二三年，他擔任了北京中華教育改進社的主任幹事，全家搬到北京居住。他組織了很多『平民讀書處』，自己家的門口，也掛上了一塊笑山平民讀書處的牌子。

這時他已經有三個兒子了，他教桃紅把平民千字課教小桃識字，後來他們就拿來教奶奶、教廚子老媽子。從這裏他發現了『連環教學法』。

他用十分興奮的心情，把這新的發現告訴朋友們，勸他們採用這個方法去教不識字的人，他說：

「這個法子是用家裏識字的人教不識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一家當中，先生教師母、師母教小姐、小姐教老媽子，每人化不了多少功夫，就可以使全家讀書明理了。」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社會關係，在北平、南京、安慶許多地方建立平民教育的組織，不分寒暑，南來北往，甚至連自己最寶貴的生日都忘記了。但是，實踐給了他深刻的教育，不從客觀的現實出發，再好的主觀意見，都會證明是錯誤的。

當他檢查了工作成績的時候，他有一個覺悟，他說：『在實踐中，漸

漸覺得平民教育的偶像也要打破，各地平民教育的影響，一百分之九十九只限於本地。他們對於別的地方的影響，微乎其微！要想普遍的影響就須普遍地辦，就須放棄模範的偶像。」

他和許多平民學校的學生通信，用最簡潔、親切的話，說出自己的意見。對於小朋友的信，更看得非常寶貴，讀着那些信，他說：「如同吃甘蔗一樣，越吃越有味！」

他把收到的信件好好的收藏起來，每逢疲倦的時候，把那些信件打開閱讀，精神就立刻加增十倍。

『小朋友的信啊，你是我精神的泉源！』在他的詩文、書信中間，隨處都可發現天真，熱情！

但是，他又具有多麼堅韌的意志——

「我們在社會上做事，就要預備碰釘子……碰釘子的時候，有兩個法子解決：第一是硬起頭皮來碰，假使釘是鐵做的，我們的頭皮就要硬到鋼一樣，叫鐵釘一碰到鋼做頭皮上，就彎了起來；第二是要把我們的熱心架起火來，把釘子燒化掉，我們只怕心不熱，不怕釘子利害！」

積極的戰鬥精神，使他的工作有些表現，至少使教育衝出了學校的大門。然而，他的理想，單憑教育力量創造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以泛愛的觀點同等地去看老爺小的，太太丫頭，都不能不被現實粉碎了。

三 『野人生活』

平民教育的失敗，使他感到中國教育的『山窮水盡』。但是，他仍然努力追尋一條生路。

他在工作中，更深刻地發現了中國教育的毛病，是做效外國，不合國情，任何教育都是爲着少數有錢人的子弟，沒有錢的非富貴子弟，絕沒有享受教育的福氣。

他認識到中國的國情是『以農立國』，人民百人有八十多個都住在鄉村裏，教育只有下鄉，然後才能收到普遍效果。

一九二六年他和他的好友趙叔愚先生商量開闢鄉村教育的道路。雖然，他們看到困難重重，卻相信前途有無窮的希望。他們有一個志願：要提倡一百萬所學校，去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使個個鄉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偉大的新生命。

這是一個天真而宏大的志願，他把全部的熱情和精力，爲着這個志願奮鬥了。

那年的冬天，他們就計劃着先開辦一所試驗鄉村師範，在南京城外荒蕪的勞山山麓，勘定了校基。站在那荒涼的山坡上，可以望見滾滾的長江；山腳下一個小小村落，就是以後全國聞名的曉莊，生活教育的發祥地。

那時正是大革命浪潮高漲的時期，第二年春天北伐軍打到了杭滬地帶，南京城也在戰事包圍中，可是鄉村師範依照計劃在砲火聲中開學了。他發出了開學通知單，上面寫着：

『農夫在砲火中要種田，與農夫共甘苦的學校，也不能爲戰事而停止招考與開學。』

三月連日春雨，十五日天空放晴，校舍還沒有蓋好，他們就在半山搭起四個篷帳，舉行了開學典禮，學生只有十三個，來賓也只有很少的人。

他很高興的對着大家說：『曉莊不同平常學校，一無校舍，二無教員。我們的校舍上面蓋的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們的精神一樣的要充溢於天地間。草屋不過避風躲雨之所。本校祇有指導員而無教師，我們相

信，沒有專能教的老師，祇有比較經驗稍深或學識稍好的指導，所以農夫、村婦、漁人、樵夫都可做我們的指導員，因為我們很不及他們之處。我們認清了這兩點，才能在廣漠的鄉村教育路上前進！」

新的生活開始了，他和十三個學生一同勞作。自己挑水，自己煮飯，自己種菜，自己挖廁所，自己建廚房。沒有宿舍，大家就先分住在農民家中，除掉了一張破爛的桌子，兩三張板凳以外，什麼都沒有，白天勞動，晚間就圍在豆大的火點下，談論着問題。

遇到雨天，他們還得上街買菜，頭上戴着草笠，衣服擦在腰裏，褲管推過大腿，手裏提着籃，掛着瓶，光赤的脚踏入污泥，雨打在身上。

這樣的生活，他告訴他的母親說：『我快樂得像活神仙一樣。整天打

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

有時，他竟然這般打扮走到城裏去，和穿馬褂的先生們一塊兒吃飯，自己都覺得很有趣味！

慢慢地，一座一座的茅屋建造起來了：閱書室、辦公室、會議室、應接室、音樂室、書畫室、陳列室、研究室都有了。他們把圓形的禮堂，題名犁宮；把閱書室題名書呆子莫來館。

犁宮裏每星期舉行着討論會，不論生活問題，學習問題都可提出來，大家爭論辯解。他總是安詳地聽着大家的意見，隨時指出問題的要點。不論什麼時候，他都提示給同志們，實際生活是真正的指南針。

他說：「實際生活向我們供給無窮的問題，要求不斷的解決。我們朝

着實際生活走，大致不至於迷路，在實際生活裏問津的人，必定要被除成見，避免抄襲。我們要運用虛心的態度，精密的觀察，證實的試驗才能做出創造的工作。」

書呆子莫來館收集了古今中外的書籍，同學們在實際生活上發生了問題，除了向師友請教，又可到這知識寶庫裏，探詢前人的經驗。

他是最反對學生讀死書，做書呆子的。主張：做什麼事，用什麼書。他說：

「舊時代之學生的生活過程，有三個階段：一是死讀書，二是讀死書；三是讀書死。新時代之學生也離不了書，所不同的，他是：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什麼是活書？活書是活知識之寶庫。花草、樹木、飛禽

走獸、山水……都是活書，活的人、活的問題、活的文化……是活的知識之寶庫，也都是活書。活的書只可活用，而不可以死讀。新時代的學生要用活書去生產，用活書去實驗，用活書去建設，用活書去革命，用活書去樹立一個比現在可愛可敬的社會。」

鄉村師範的學生們在附近村莊最先開辦起中心小學，可是，農民都用不信任的眼光來看他們。他們到農民家中勸說，請他們讓孩子到學校讀書，得到的是一些冷漠的回答：

「你們是教洋書的！」

「你們是要教小孩信洋教的。」

「你們不會唸孔子的四書五經吧！」

「怎樣好好爲人教書，會不要學金的，必是所教的要害人，騙人！」
「你們學堂要穿好衣服，我的孩兒不能進！」

工作中碰了壁，他們更確切知道，要使工作順利，就得先和農民做朋友，改正知識分子의 思想和態度，拜農民爲先生，主動的去接近農民，要切實爲農民做有益的事，所以每人都規定時間「會朋友去！」

他們在附近鄉村辦了很多中心民衆茶園，放有書報、棋子，利用農民空暇，提倡正當娛樂，娛樂中進行教育。還辦了醫院、診所、合作社，都分頭由講師帶領同學在幹着。而他每星期必有一次實地參加生活，共同研究，討論、解決種種問題。

事實勝於千言萬語，農民們和學校很快打成一片了。大家熱心的響應

學校的號召，參加修路、開運動會、展覽會。中心小學一個一個辦起來。

一週年時，家家都停了工，參加學校的慶祝會。黎宮掛滿了『我愛農村』，『新我農村』的扁額，農民都穿上了只有新年節日纔穿的新衣，打鑼敲鼓，吹笛吹笙，放鞭炮，歡呼着從綠色的村野到學校來！

他時常警惕同學，努力合作實現鄉村師範的計劃，他們抱着『訓練真農民使生產力與武力合而為一』的理想。他告訴同學：『我們第一步要謀中國三萬萬四千萬農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東亞各國農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農民之解放，這個學校不但要做中國教育之出發點並且要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

那時，農村中土匪很多，他便把曉村周圍十幾里路的村莊民衆組織聯

村自衛團，買了二十多支毛瑟槍，還有幾支手槍盒子砲，並且請了一位當過團長的教官做指導，曉莊的同學們都編隊受軍事訓練，輪流站崗守夜。

自衛團組織起來，鄉村中比較安定一些。但是，土匪的恐嚇信卻不斷的向學校投來了。同學們日夜巡哨防範。有一次，傳說土匪夜間攻打學校，空氣緊張起來。他卻鎮定的安慰同學們：

「土匪當真來了，不要怕，不要亂開槍。土匪也是人，他也需要教育。他如果把我們同志捉了去，就去辦土匪教育，把他從土匪裏搶救出來。」

在學校中，他像一個慈愛的母親一樣，關懷着同學們的生活起居。學校經費困難，他和指導員都只拿很少的生活費；有時，他還得把稿費捐出

來，度過難關。

學校有一個時候，困難到極點，有人主張把唯一的一個校工裁去，留下的工作由同學們替做。他很沉痛的表示不贊成這樣辦法，他說：

『打破我們唯一校工的飯碗，我心裏有些不忍。我們的生命裏，都含有他的氣力所變化的血液，他也是我們當中的一個，決不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我們因為經濟的緣故而失去同志，是可恥的。』

多麼深沉的發自內心的話語！這種誠摯的愛護，他隨時給予每一個人，不論同學，不論老百姓。

『在立腳點要平等，

於出頭處求自由。』

可說是他的新的道德觀點。他從沒有輕視別人，或把別人的頭壓下去，把自己的頭高出來。

他最明白下層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有一次工人給學校鑿井，沒有鑿到泉下就中止了。臨走的時候，請他題字，他就寫了八個大字：「下層工作務須澈底！」

他很高興地把這個小故事，講給別人，希望大家一齊下井挖到活泉為止。

『下井挖到活泉』這就是他所以能夠不斷進步的根據。

三年不斷的刻苦努力，曉莊由一個荒山變成生氣勃勃的新教育的實驗

園！

生活教育的理論系統，在他的實踐過程中，全部建立起來。「生活即教育」是他的教育本體論，「社會即學校」是他的教育領域論，「教學做合一」是他的教育方法論。

生活教育的鐘聲，在整個中國擊響了宏亮的聲音。

但是，政治的迫害向這個園地襲來了。

由於曉莊同學和農民的結合，背叛了人民的南京政府害怕起來。他們編造許多荒謬的謠言，說曉莊私通「匪黨」，「窩藏武器」，「圖謀暴動」。

一九三〇年的秋天，曉莊被宣佈了死刑。憲兵把封條貼上了黑板。有幾個同學被捉去了。並下令通緝陶行知。

陶行知不得不開始了逃亡生活！

四 『通緝令下』

曉莊師範被封的前一年冬天，他的妹妹文漢不幸死去。當他十幾年來投身在新教育工作裏面，幾乎沒有照顧家事的時間，她分擔了他的許多責任。喪失了她，真够哀痛了。可是，在哀痛中，事業又遭到突然的迫害，同志四散，爲着生命安全，他又不得不避居到上海租界中去。

這時，他感情上的負擔多麼沉重，他用樸實的詩句抒發那傷別、憤慨、網織在心頭的情思——

多情最是人間夢，

南北東西路路通。

夢魂自有幾機在，

那怕關山兩萬重！

對於當時的剝削欺騙反人民的政治，他直率地暴露：

假軍隊，

忍看河山碎，

他自有本事，

會殺親姊妹，

假官吏，

嘴上有主義。

吃了百姓飯，

在上海租界，避居愚園路，他埋頭寫稿，維持生活。後來和申報史量才先生創辦了一個自然學園。他把全部精神又放在自然科學的研究上面。

寢室變成了化驗室。桌子上架子上，佈滿了實驗的器械，藥瓶，科學書籍。他整天做着電學的，化學的實驗，辛勤工作，興趣很高。這也使得他的情感得到排遣。

他感到中國大衆缺少「科學新知」，所以就提倡「科學下嫁」運動，把科學下嫁給兒童，下嫁給大衆。於是，他着手編著了一部內容完善的兒童科學叢書，創辦了兒童科學通訊學校，後來還親自編寫天文學活葉指導。他的兒子做着他很好的助手。

每當黃昏，馬路旁的廣場，屋頂上的晒台，就是他們的天文台，望着那滿天閃爍的星羣，他指手劃腳的講說那些星體的知識，孩子們驚異他知道的东西那麼豐富。

他的幾個學生那時在蘇北淮安城蓮花街主辦一個新安小學，由於「曉莊」的被封，環境也更為困難，他仍然不斷地給他們物質上及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賣稿賣字得到很少的錢，設法分出來幫助他們。政府的通緝令下面，他的通信都喪失了自由，所以他只好用「何日平」，「不除庭草齋夫」等等的化名寫信給他們。那時他的思想已從改進農村向着現代工業的前途展望，他的信中說：

「從農業文明渡到工業文明，必須特別注意科學，以培養創造，建設

生產之力量，現代之教師，每人必須終生探討一門自然科學。」

而對於學校的發展，他是堅持要使學校成為羣衆自己的學校的方針。

「你們要和當地的農人聯合起來，共同設法使學校發展，使他們能自己保護自己的學校，使學生能夠自己管理學校，然後新教育才能永遠推動，產生效力！」

就在他的這種精神的指導下，新安小學在一九三六年有新安兒童旅行團的組織：七個孩子沒有教師領導，開始全國旅行，從蘇北到了上海。那時正是淞滬抗戰之後。

陶行知看到這一些孩子的時候，他感到無限的興奮，以「小工人之禮」招待他們。從他們的身上，他更看到兒童的力量。他說「他們是新時代無

價之寶，這樣的偉大的寶藏，世界上誰也沒有！」他寫了一首活潑的頌讚他們的詩歌：

一羣小光棍，點點有七棍；

小的十二歲，大的未結婚。

沒有父母帶，先生也不在，

誰說孩子小，劃分新時代。

新安兒童旅行團宣佈他們旅行的目的是：

「第一，看看江南的風光，讓我們實際明瞭地理、歷史風俗、人情等社會科學的實質。

第二，看看近代的工業文化，讓我們實際地明瞭自然科學給予人類文

明的影響。

第三，看看淞滬的戰地，讓我們實際地明瞭帝國主義的殘暴，作奮鬥圖存的最有效的鼓勵。

第四，打破成人不信任小孩子也有獨立自由行動的能力的錯誤觀念。他們後來輾轉旅行了中國南北各省，遠到蒙古沙漠，為『社會即學校』的主張，做了有力的證明。

同時，在南京曉莊的小學生因為先生們都四散走了，他們為着學習不致中斷，大家組織起來自學。他們把互相學習的情形告訴陶行知。他真高興，馬上寫一首詩寄給他們，說是——

有個學校真奇怪，

大孩自動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

先生不在學如左。

回信來了，孩子們很感謝他，但也向他抗議：「陶先生，大孩能自動，小孩就不能自動嗎？大孩能教小孩，小孩就不能教大孩嗎？」

陶行知認輸了，他完全接受孩子們的意見，把那個「大」字改為「小」字。以後不論在什麼場合，他常笑嘻嘻地把這事告訴別人，糾正大家一向看不起小孩的錯誤觀念，他說孩子們是他的「一字師」。

從許多兒童發揮的智慧和能力的實例上，他認識到小學生是普及教育可以運用的力量。建立了「小先生制」、「即知即傳」的理論。

他批評用老法子要想達到普及教育的目的，學齡兒童的教育要再過一百年纔能普及，失學成人的教育再過四百年纔能普及。如果中國的普及教育一定要這樣辦，那就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他說：「師範生乃至整個知識階級不是教師唯一的泉源。小孩子最好的先生是前進的小孩。大眾最好的先生是前進的大眾。知識分子的使命，在幫助前進的孩子和前進的大眾取得現代知識以同化他們的夥伴。知識分子只可做小孩與大眾的顧問。超過顧問的範圍，就要損害他們的自動精神。即使做個顧問，知識分子也得跳進與大眾的隊伍裏去與他們共患難同休戚，才夠得上顧問的資格。」

「一二八」抗日戰役後，民族危機嚴重，他看到團結大眾保衛大眾的

重要。根據曉莊的實踐經驗，他又提倡『工學團』制。工學團的意義是：『工是工作，學是科學，團是團體。』就是『以大衆的工作養活大衆的生命，以大衆的科學明瞭大衆的生命，以大衆的團體力量保護大衆的生命。』這樣就是把『工場』，『學校』，『社會』打成一片，產生一個富有生活力的新細胞。

他派了生活教育社的兩個同志，在寶山縣大場區與上海市交界的孟家木橋籌辦了一個山海工學團。不到一年功夫，學生由十幾個人增加到三百多個人。他們後來又組織了養鷄工學團、蒸機工學團、棉花工學團、養魚工學團，創辦了木工場、籐工場、農場等等的生產團體，解決了事業的經濟問題。

『小先生』普遍了附近的鄉村，他們學會了什麼，馬上就教別人；農民的家中，都變成了學校的課堂。陶行知鼓勵着他們堅韌不屈的去開展工作，他說：

『小先生要一生來不怕碰釘子，碰了一根化一根』。要「上天無路造條路，入地無門開扇門」！』

他爲着幫助農民改進農業，替棉花工學團捐了很多改良白籽棉種，還捐來了『條播機』、『打稻機』，替養魚工學團捐了『抽水機』。

在夏天如火燒一樣的陽光下，他穿着白布衫褲，黑布鞋子，親自架着黑色的條播機，用溫和的說話，告訴農友們怎樣推，怎樣拉。農民們圍繞着他，聽着他的指導，歡笑堆在紫銅發光的臉上。他們很快地也學會使用

這從沒有使用過的工具了。

農民們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不知怎樣表示謝意。他們商量一番，才決定送他一首詩，詩中說：

不老也不少，

剛剛四十四，

不矮也不高，

不瘦不臃腫，

生得真漂亮，

頭上不戴涼草帽，

白布衫褲黑布鞋，

近看像個樵下佬，

還看像個美少年，
原來是個教育家，
太陽如火燒，
潑顏到農村裏來救！

衣裳農民化，
知識化農民，
用了新的思想化農民，
對待百姓如親人。
溫和態度指教我們，
農人見您如親人。
創造小先生制，

教育可普及。

改進農業，

農村不會破產。

假使中國有一萬個附行如

農家子弟幸福真無窮！

五 抗戰年代

一九三六年日本法西斯向中國的侵略更加緊急，中共的抗日號召，獲得了全國各階層愛國人民的擁護，救亡運動在上海及各大城市展開了。

上海文化界在呂班路勝利飯店召集了一個會議，發表了有力的救國文告，呼籲聯合抗日。陶行知抱着滿腔的熱誠，參加這個會議，在宣言上簽上了他的名字。

從此，他把教育工作更密切配合在全國救亡運動的指標下。他還用那通俗有力的詩歌，宣傳聯合抗日的主張。

號召：『學生店員聯合起來，爲民族解放而鬥爭！』

號召：『婦女大眾走出閨房，別下不抵抗軍人的軍衣，讓我們一齊穿上，衝向民族自救的戰場！』

號召：『要爲中華民族求解放，只有大眾起來戰！戰！戰！』

後來，爲着團結華僑和爭取全世界反侵略運動的援助，他受了中國全國救國會的委托，擔任了『國民外交使節』出國，從南洋到歐洲到美洲，經歷二十八個國家，他的足跡走到那裏，那裏就掀起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浪潮。

當秋天的時候，他到了法國巴黎。旅歐的華僑熱烈地歡迎從祖國來的救國會代表。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起來，陶行知出席了這個大

會，面對着那許多激昂的羣衆，他朗誦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長詩，他的沉着寬宏的聲音中，包藏着澄明的理智和如火的熱情。羣衆的情緒高漲，法郎金飾紛紛捐獻出來，歡呼「團結抗日」的口號，震動全場。

這一首詩充分說出了陶行知對於聯合抗日的正確主張。他說：救國不能包辦。「包辦要包成大光棍，光棍如何能救國？」對於聯合的條件，他提出要坦白，要誠懇，要批評，要避離開，要改善大衆生活，要有中心，要在戰場上聯；這些意見糾正了一些對於「聯合抗日」的偏頗見解。

聽啊，是多麼嚴正的聲音——

人人都設個結好，

只有猜疑忘不了。

大家都怕人利用，
一盤散沙造成了。

人人都說團結好，
只有批評受不了。
馬馬虎虎想敷衍，
結果只有一團糟。

人人都說團結好，
竹槓只對大家敲！
如果要想救中國，
大眾肚子吃得飽。

從巴黎到英國京城倫敦，已經是紅葉紛落的深秋，在南山公園中，他計劃着工作，抒寫着救國詩篇，有時寫幾行短簡寄給祖國的同志和愛人。繁忙的工作從沒有妨礙他對友人們的懷念和關切——

短短信，

長長寄。

事情忙，

盡我筆畫兒聲，

與人苦相識。

多麼動人的詩句，多麼超脫的至情！

第二年的春天，他和中共代表吳玉章先生一同出席倫敦世界反侵略大會。他們同去瞻拜馬克思的墳墓。荒涼的墳場，樹立着無數大大小小的墓

石，他們茫然不知那一方土地埋葬着這一曠世偉人的骸骨。尋覓，尋覓，最後他們纔尋到了『二四七四八』號墓石，那裏樹着恩格斯所題的墓誌。他們兩個肅立在這墓誌的前面，驚嘆偉人的平凡，陶行知獻出了他的禮讚——

光明照萬世，宏論隨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墳葬偉人。

他從歐洲到了美國，『七七』抗戰爆發了。美國那時對於日本法西斯還採取着放任政策，繼續把軍火，槍砲及別人的物資，一船一船運到日本去。留美華僑的情怒情緒，無法壓抑。

陶行知在紐約領導着學生團體，到處演講，揭發日本法西斯的殘暴和野心，使加強美國對中國的認識。

他站在紐約的碼頭上，美國軍火商正指揮工人們把軍火搬上到日本的輪船，他用鋒利的演講阻止這種助暴的行爲……

他說：『日本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人是美國軍火幫助殺死的！工人們！站在正義的立場，要拒絕搬運助日的軍火！不要替劍子手做助手！』

美國的碼頭工人兄弟們，用堅決的行動回答了他的號召，發動了大規模的罷工拒絕搬運助日的軍火到船上。他勝利了！

他的照片大幅的在美洲各地刊載出來。

一九三八年他回到了抗戰的祖國，保衛武漢的工作正在進行。但是，頑固派不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肯民主地動員羣衆抗戰。並且政府中還用着

德國法西斯顧問。

陶行知從廣州到武漢，一路上所見的是一羣一羣的壯年人，用繩子手連手的像犯人一樣捆着走過，後面跟着背鎗的士兵，好像押上法場去，個個是悲慘得一聲不響。他奇怪這是什麼一回事，打聽一下，才知道這些被綁的人都是預備去保國衛民的壯丁。他的母親妻子都被無顧的拋在饑餓裏。

他對這種荒謬的措施感到極度的憤慨——

『這樣抽來的兵，怎樣能夠發出充分的力量！』

後來第二次參政會開會的時候，他以參政員的資格，抗議這種捆綁壯丁的行爲，提議建立志願兵區補充兵役。然而這議案卻被頑固的政府高高

放起來。他知道爲着抗戰的勝利，對於頑固勢力還要不斷的鬥爭。

他決定離開武漢到重慶去，佈置保育下一代的工作。經過湖南長沙，在那裏遇到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他們都問他：「爲什麼不留在武漢，參加『保衛大武漢』的工作？」

他幽默地告訴他們說：「有了陶德曼就用不着陶行知。」陶德曼就是德籍顧問。他的話語包含着多大的諷刺和痛恨。

他到了戰時的重慶，是一九三九年的春天。那時成千的戰區難童，都疏散到了後方。這些人才的幼苗，經過長途的顛簸，遭受了砲火的驚恐，喪失了親愛的父母，像一羣被狼羣追趕的羔羊。饑餓使他們面黃肌瘦，寒冷使他們萎縮一團。因爲沒有被服，他們用報紙蓋在身上，希望遮住冷

風，可是，一陣風來，報紙都被吹破了；哭泣，號叫，呻吟，度過不少苦難日子；直到從政府取到一些救濟衣物，有許多小生命已經埋在荒野山麓了。

陶行知看到這種景象，十分痛苦。他與賑濟委員會接洽經費，徵集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決定開辦一所難童學校，選拔天才的難童給他們一種合理的教育。他說：「這個學校在於培養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能力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夠發展，就必須給予適當的陽光，空氣，水分和養料，並掃除害蟲。我們愛護和培養他們正如園丁一樣，日夜的辛勤工作着，希望他們一天天的生長繁榮。在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必須要在集體生活中來學習，要為整個民族利益來造就人才，因此我們要引導學生起來

做追求真理的小學生，做自覺覺人的小先生，做手腦雙揮的小工人，做反抗侵略的小戰士。」

在重慶北碚的草街子，一座古聖寺中，有名的育才學校正式創立了。他又在重慶管家巷成立了曉莊研究所，這裏成爲推進抗戰教育的司令部。

他住在管家巷二十八號的小樓上，那一個房間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幾乎很少空地了，可是，他就在這裏運用着他的思想和智慧，計劃着怎樣開闢學校的前途，怎樣去和那無時不在侵襲着他們的困難和迫害作鬭爭。

育才的教學制度，比過去曉莊時代有了發展。課堂教學和分組的集體學習有了更好的配置。先生把學習的方法指引給學生，啓發學生在學習實踐中，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先生隨時指導糾正，並且和學生一起生活。

陶行知來往奔跑於重慶和北碚間。他和同學們都吃着兩頓稀飯一頓乾飯，吃的菜早上是豆子，中午是豆子，晚上還是豆子。生活艱苦到極點。

許多朋友看到了他這種精神，都大大稱頌，說他『苦幹』。但他卻說：

「我是反對苦幹的，苦幹一定幹不好。在幹一件事情之先，應當了解爲什麼幹？爲誰幹？這樣，即使遭遇任何苦難，也不覺其苦，祇覺其樂。因此，我就歷來主張快快活活的幹。」

抗戰後期學校經濟更困難了，政治上的迫害更嚴重了，特務們公開地撞進學校恐嚇。又有人勸他——

「你還是把學校停辦吧！何必抱着石頭游泳呢？」

他大笑起來，說：

「不，我是在抱着愛人游泳呢！」

他學着武訓的精神去募捐，把事業堅持下去。每日與柴米油鹽賽跑，除了工作，他幾乎沒有休息的空暇。

有時，深夜回來，輿議還好，就拉着他的兒子或學生走到外面散步。在清新的夜色裏，講說些故事、家常。買幾個橘子，或吃一碗湯麵，就算最大的享受了。

他在創造宣言中寫着——

「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熱情，便是創造之神所愛住的行宮，就能開創造之花，結創造之果，繁殖創造之森林！」

這樣，他度過了艱苦的抗戰年代！

六 民主戰士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日本法西斯投降了。

『勝利帶回了一切，把戰爭所分散的帶回來，把戰士帶回來，把傷兵帶回來，把顛連困苦流離失所的人帶回來，……』可是勝利也『把官運帶到漢奸的頭上來；把霉運帶到了極的門前來，把金銀財寶帶到會飛的人的手裏，把三光自由帶到敵偽的掌握裏來，把內戰的隱憂帶到每一個老百姓的心裏來……』只『沒有把和平帶回來，沒有把民主帶回來！』

陶行知面對着這種現實，感到無限的悲憤。他投身在反內戰，爭民主

的運動裏面，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主持民主教育月刊、民主星期刊。

他又幫助一些職業青年創辦了一座社會大學，這個學校是學生自己發起，自己籌款，自己選校董，自己舉校長。在中國真是一個創舉。

他說：『大學之道，在明民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什麼是民德呢？就是覺悟、聯合、解放，還有創造——要搗碎痛苦的地獄，創造人間的天堂，教人民做主人，不讓公僕造反，為老百姓造福，不靠高調唱得響。農場、工場、會場、商場、廣場、戰場、娛樂場，都是我們數不盡的課堂。我們要各盡所能，各學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重慶的羣衆團體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治協商

會議成功大會，反動派指示特務暴徒，在會場上造成血案。育才學校的隊伍被特務衝散，大家急速退回管家巷，可是陶行知不見回來。同學們焦急地等待着校長，怕他遭遇了不幸。孩子們有些都氣憤得流着眼淚。半點鐘後，他鎮定地回來了，同學歡呼起來，把他圍住了。

他只簡短而堅決地說：「沉着！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血，用生命去爭取，才會到來的。」

反動派是無恥的，他們佈置了暴行，卻又卑鄙地控告被毆辱的民主人士。陶行知被他們傳到法院去，誣他指示育才學生行兇。他，勇敢地站出來，指斥這種無恥的陰謀。當他從法院出來趕回參加育才同學會成立時，他說：

「我們每一個人好像是一塊石頭，如果彼此凝固得很緊，便成爲了一座堤，水由堤上流下去，衝動了水輪，便可發電，產生熱，產生光，產生力量，若果其中有一塊石頭凝結得不緊，別人便可以用它來擊潰這整個的堤。」

四月間，他離開了駐留七年的重慶，回到上海，他住在呂班路一個三樓亭子間裏。他仍然一面參加領導民主運動，一面計劃着育才的復員。有時他走到附近的公園中，呼吸清新的空氣，卻深思着一天的工作。

他和青年們在一起，總是溫和平靜的談天說地。說得那麼親切入耳。不論什麼道理，從他的嘴裏說出來，都格外明確易懂。

「陶先生，究竟什麼是民主呢？」有人問他。

「民主沒有深奧的意思。通俗點說，就是大家有份。在倒楣的時候，是有禍同擔；在幸運的時候，是有福大家享；在平常的時候，是大家的事，大家做，大家談，大家想。」他從容地回答。

「陶先生，我們應該學些什麼？做些什麼呢？」

「我們要跟老百姓學習，學習人民的語言，人民的感情，人民的美德，努力發現人民的問題。要認識他們就是中華民國真正的主人，要他們告訴我們怎樣為他們服務才算滿意。」他常是這樣回答你。更照你的情況，給你具體的出主意。

當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北站十萬羣衆歡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請願，陶行知也出席了。會場中有一個青年走到他跟前說：

「也許今天又要重演較場口的事件，先生要小心些！」

他沉重的說：「那不是我們的事，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來參加，難道不是預備挨打的嗎？」

會中他站在主席台上發表了沉痛的演講。

昆明聞一多李公樸的被特務慘殺，特務又把他列在「黑榜」，給他很大的刺激。朋友們關切他的安全，要他提防「無聲手槍」。他說：

「國民黨專橫獨霸已經有二十年了。他們擁有全國的軍隊和警察，然而他們還要像蛇蝎一樣的向上爬，去盜竊那些進步的手無寸鐵的評論者的生命！」

他的聲音裏，包含着憤怒和悲痛，他截釘般說——

『我等着第三鎗！』

他搬到愛棠路一個朋友家中去住，他想在生命未完結前，專心一致完成他的一部十年詩史，和一些未完全兌現的『賣字興學』的工作。

他寫信給育才的師生

「公樸去了，昨今兩天有兩方面的朋友向我報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確實，我會很快地結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的結束不會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結束，我提議爲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感召一萬個人來頂補，這死了一百個人就是一百萬人，死了一千個人就是一千萬人。我們現在第一要事是感召一萬位民主戰士來補償李公樸先生之不可補償之損失，祇有這樣纔是真正的追悼。平時要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達者不戀」的

精神培養學生和我們自己。有事則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動」相勉勵。」

而這竟成爲他最後的遺書。

七月二十五日他竟患了腦溢血症，結束了五十五歲的生命。

「真是天變地異呀，又崩頽了一座泰山，這是教育的災難，民主的災難，人民的災難。我們要瀝膽披肝，不斷的向前，補救這無窮的災難，陶先生你安息吧，我們要保守着你的旗幟，不斷的向前！不斷的向前！」

在陶行知的弟子們、朋友們悲壯的歌聲中，陶行知躺在花園裏，穿着一身樸素的學生裝。

毛澤東和朱德從延安打來了電報：

「先生爲人民教育家，爲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爲中國人民之鉅大損失。」

他的遺體安葬在南京的勞山之頂。淳樸的農民攜着香案迎接他的靈柩，哀哭他像死了自己的親人。